

大国无战争时代美国弱联盟体系 与新型地区秩序竞争

徐进 薄荣康

[摘要] 在大国有战争时代,稳固的强联盟是霸权国增加实力、获得战争胜利从而以自身偏好塑造国际秩序的有效途径。大国无战争时代和内嵌型的对手特征增加了霸权国对弱联盟的使用偏好,核武器的出现、主权原则深入人心和经济相互依赖使得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变得异常困难,同时,作为霸权国的美国面对的竞争对手内嵌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与美国的亚太盟友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弱联盟成为美国参与亚太地区规则秩序竞争的有效补充策略。弱联盟基于实用主义取向,可以基于不同议题不断重新选择小集团成员,更具灵活性塑造基于规则的秩序。美国构建的弱联盟是强联盟的有效补充,具备明显的大国竞争倾向,核心目标仍旧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中国需要细致剖析美国在不同领域领导的小集团发展路径,从而加强精准施策,实行“楔子战略”,拉打结合,分化弱化美国反华联盟,为自身发展营造持久有利的周边环境。

[关键词] 弱联盟;强联盟;大国无战争时代;地区秩序竞争;霸权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5.01.001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5)01-0003-(11)

[收稿日期] 2024-06-2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023YZD049)

[作者简介]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薄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00)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联盟类型的调整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转型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回溯历史,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每一次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动都伴随着权力的更迭与战争。联盟是霸权国增加国家权力的一种常用策略,取得战争胜利的国家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塑造当时的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武器的成熟使得大国之间战争成本变得难以承受,

主权规范的深化也促使武力兼并他国领土不再成为大国决策的主要选项,因此国际体系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1]

国际秩序变革中武力效用降低,国家间联盟也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联盟议题扩展到经济、文化等低位政治领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联盟构建上打破传统强制度约束军事联盟模式,增加小多边安全联盟比重,旨在构建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形成新的区域安全秩序。^[2]区别于传统联盟,这些小集团虽然聚焦于传统安全领域,突出遏制中国的制衡色彩,但是其缺乏强有力制度约束和明确的惩罚性措施,美国在原有联盟体系下重新挑选成员构建的新型弱联盟,为联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

历次国际秩序变迁的经验证明,霸权国倾向利用强制度约束的安全联盟制衡对手,增加联盟成员数量和规模以增加自身集团实力,以期赢得战争的胜利。令人疑惑的是,虽然美国成立了诸多弱联盟,但成员依旧为原先的盟友,其亚太联盟体系的总体实力未发生变化。此外,按照现实主义逻辑,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不断提高,美国应该不断加强与盟友之间的制度约束,防止盟友被竞争对手拉拢。但现实情况是,美国不顾破坏原有联盟信任和凝聚力,在原有联盟体系下不断组建小团体,将诸多议题和问题解决机制转移到新的小集团,并且新型联盟的制度约束远弱于传统军事同盟,缺少强制性条约和惩罚性机制,美国选择新型弱同盟进行地区秩序竞争的原因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二、联盟与地区秩序的既有研究及评析

学术界对“联盟”概念的定义分为狭义与广义两大范畴。狭义层面,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对联盟进行了严格界定,认为其是在特定情境下,为应对外部国家而建立的、旨在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国家间联合体,该联合基于明确的盟约,且盟约中明确规定了军事合作的条款。^[3]广义上,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对联盟的定义进行了扩展,将其视为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4]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美国的联盟形式也不断增加,除了传统的军事联盟,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展了灵活的临时联盟或事实联盟。出于现实考虑,本文认为需要给予联盟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将联盟定义为国家针对内外部威胁、联合其他国家的合作范式。

秩序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概念,现实主义主要探讨国际权力结构对国际秩序的影响。^[5]自由主义认为价值观、制度、原则等因素是分析国际秩序的核心。^[6]建构主义者主要从规范和认知层次分析国际秩序的演变。^[7]英国学派认为共有文化和国际制度会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8]上述流派对秩序定义的不同主要源于他们对影响国际社会安排的核心变量认知不同,唐世平认为秩序是社会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事情的可预测和规律性程度,影响系统运行的变量都需要加以考虑。^[9]本文认为秩序构成涉及权力、利益、观念和机制多重要素,因此将地区秩序界定为既定地理范围内行为体之间互动形成的特定安排,区域内的权力、制度以及观念都会影响地区秩序的运行,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区别在于秩序覆盖的地理空间范围不同。

联盟是权力政治的主要表现和特征,因此现实主义者关于联盟与权力格局对秩序的影响

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均势理论和霸权稳定论对联盟和秩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均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国际体系内行为体权力分布的均衡有利于秩序的稳定,国家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企图打破平衡的行为体。基辛格则强调,秩序的建立在均势与合法性两大支柱,任何一方面的变动都会导致秩序的相应调整。这一观点凸显了均势与合法性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中的关键作用。^[10]

对于均势理论的支持者来说,结盟被视为一种关键策略,旨在增强国家实力和维持势力均衡,从而对维护秩序稳定、调控战争与和平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霸权稳定论的创建人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19世纪末的英国通过推动自由贸易,为欧洲带来了稳定局面;而二战后的美国也发挥着类似作用。^[11]约翰·伊肯伯里针对东亚地区秩序提出见解,他认为尽管该区域正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美国主导的双边安全联盟体系,即“轴辐体系”,始终是维护地区稳定的核心要素。^[12]祁怀高同样指出东亚地区的秩序均势离不开美国的联盟体系 and 中国的伙伴关系网络。^[13]孙学峰与黄宇兴认为尽管东亚尚未形成一个全面覆盖的地区秩序框架,但无可争议的是,美国的联盟体系与中国作为两大核心因素,对东亚地区的秩序构建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14]

现实主义关于联盟与秩序的影响聚焦联盟对战争和权力格局的影响,提出了经典的论证和结论。随着国际社会现实的发展,尤其是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到来,上述研究无法回答,当战争效用降低,联盟体系内联盟对象不发生变化,即联盟没有对权力格局造成颠覆性影响的前提下,联盟重组和类型变化是否会对地区秩序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弱联盟的出现给予了联盟与地区秩序理论创新的空间,上述现实主义理论聚焦于传统军事安全联盟,关于联盟对权力格局、秩序影响的论证是否适用于新型弱联盟有待进一步考证。

冷战结束后,议题联盟(Issue Coalition)现象频繁涌现,其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该概念的定义及形成动因。^[15]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议题联盟是国际行为体(涵盖国家与非国家实体)针对特定议题而构建的一种较为灵活的多边合作框架,保罗·迪布(Paul Dibb)将其描述为“基于各自原则保留前提下的临时性合作联盟”。^[16]除此之外,准联盟、谈判联盟及联合阵线等研究,为理解较为松散的联盟形态提供了宝贵视角。孙德刚认为国家之间的非正式安全合作可以称为准联盟。^[17]刘丰系统分析了国际政治中联合阵线的成因及实践应用。^[18]夏立平着重分析了议题联盟对南海秩序的影响。^[19]任琳强调了议题联盟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20]议题联盟作为冷战后国际合作的一种新形态,其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上述研究都认为议题联盟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多边合作形式,临时性、功能性较强,能够给本文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议题联盟与本文的弱联盟概念并不一致,本文的弱联盟概念不仅强调在特定议题上的灵活处理,更强调联盟的应用场景为制衡对手,包括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安全领域,制衡对手、塑造秩序是强弱联盟的共同特征,因此弱联盟和强联盟一样都属于制衡性联盟中的一种,只是不同场景下制度约束强弱有所区别,不能和具体议题上的议题联盟混为一谈。美国正在把弱联盟、小多边作为制衡中国的主要联盟形式,并且谋求将弱联盟常态化、网络化,成为影响亚太秩序的重要变量,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弱联盟与新时代地区秩序竞争

弱联盟为本文的概念创新,采用这一概念视角的操作依据如下。首先,关于联盟解体和分化的研究普遍对联盟的负向瓦解作了度的区分,例如由弱到强分为预阻敌手结盟(*prealignment*)、削弱敌对联盟(*disalignment*)、拆散敌对联盟(*dealignment*)和转化敌手盟友(*realignment*)四类。^[21]与之对照,增强安全承诺而不正式结盟相当于削弱而未拆散敌对联盟的反面镜像,非正式的联盟也应该算作联盟的一种;其次,定义联盟的要件是军事条约,但何为军事条约是有弹性的,戴维·辛格和梅尔文·斯莫尔就将联盟条约分为共同防卫联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协约三类;^[22]最后,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美国联盟战略的内涵也不断丰富,除了传统强秩序约束的军事联盟,美国为实现特殊利益需要而建立了海湾战争中的临时联盟,同样建立了未签订条约却提供安全保护的事实联盟,再到类似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这类安全色彩浓重但尚且缺乏强制性约束的弱联盟,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为联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

(一)强弱联盟共同服务于霸权国的制衡战略

类型化(*Typology*)可以将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具体化,在界定研究范畴、辨识解释要素以及构建因果逻辑链等研究步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3]本文依据联盟是否具备明确的制度约束性,把霸权国为制衡对手而形成的联盟架构区分为强联盟和弱联盟。制度约束的效力源自其内在的规制与锁定能力,能够促使各国在安全、政治及经济层面做出长远的、难以撤销的承诺。这些具有约束力的方式涵盖了诸如协议、联动组织、共同管理职责、关于相互关系的统一规范及原则等多个方面。

强联盟指联盟内部约束性机制明确有效,联盟内成员将联盟视为一种契约,缔约国为了共同的目标与使命,制定了具有中长期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旨在共同抵御外部威胁。在面对重大紧急事件时,这些国家能够互相支持,强化协商机制。北约和华约即为二战后典型的强联盟范例。此类强联盟与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狭义联盟观念相吻合,它们是在特定情境下,为应对外部国家而可能采取(或不采取)军事行动的正式国家联合体(*Associations*)。这些联盟建立在正式的协定基础之上,且军事协作条款在协定中明确列出。

弱联盟指该联盟体系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缺乏违反联盟规定的有效惩罚措施,这些联盟一般是为应对某些具体问题临时组成的机制,或者由于成员分歧过大无法做出有效统一强联盟而做出的功能性选择。弱联盟体系具有明显的功能性特征,各国结盟动机具有多重性,结盟对象和所要化解的风险具有动态性和变化性。除此之外,盟友之间本着务实主义精神,从眼前重大安全关切出发灵活地选择联盟,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偏好。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弱联盟概念与议题联盟有所区别,弱联盟和强联盟同属于美国制衡性联盟,其目的是进行大国竞争、争夺世界主导权。首先,美国制衡性联盟的对手为具备威胁性的其他大国,即冷战时期的苏联、冷战后的俄罗斯和中国,因此美国在针对恐怖主义建立的联合阵线、美国与以色列等国的事实联盟(*de facto alliance*)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其次,安全合作是联盟的核心内容,这可以使本文的研究对象更加聚焦,互联网未来联盟、价值观联盟等议题联盟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弱联盟的典型代表包括美国在传统盟友关系上进一步发展

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日韩三边合作、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美日菲等多边安全协作框架。这些联盟主要在传统军事合作的基础上深化,具有鲜明的安全导向和制衡特征,但它们的制度性约束相对较弱,展现出比传统安全联盟更高的灵活性。

美国虽成立了诸多弱联盟,但成员依旧为原先的盟友,传统军事同盟北约的合作也并未有改变,弱联盟并非为强联盟的替代,而是对传统联盟体系的补充,是一种增强可信承诺的做法。弱联盟有效缓解了因集体行动而带来的困境,这种合作形式在新兴的地区秩序竞争中展现出更为显著的优势。作为这一联盟的领导者,美国能够通过自身的示范作用引领合作方向,主动承担起关键性的责任。同时,美国还会根据各成员国的具体情况来精准定位合作的重点领域,并进一步强化对成员国的协调与指挥能力,并且在合适时机推动弱联盟的机制化建设,甚至向强联盟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制衡对手的竞争战略。

(二) 大国无战争时代和内嵌型对手增加了美国对弱联盟的使用偏好

在大国战争频发的时代,武力和战争成为了国家间处理利益冲突的首要选择,战争的胜者往往能最终裁定利益的分配。具备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无需进行谈判妥协,它们能够依据自身的意愿来构建秩序。由于战争不断,国家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既现实又紧迫,导致国家的未来预期大打折扣,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以至于今日的盟友或许转瞬之间便成为明日的对手。因此只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才能使得联盟发挥有效的作用,制度约束可以使各国在安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长期承诺,这些承诺是难以被解除的。因此,与其他国家结成稳固的强联盟,增加自身国家集团实力,以联盟内霸权国家本身偏好影响秩序走向,是霸权国塑造地区秩序的有效途径。

大国无战争时代,弱联盟是美国面对新型对手所采取的一种补充性联盟战略。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如何避免战争已经逐渐成为各国人民心中的共同期望。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主张通过贸易途径获取利益,其成本要远远低于战争手段。^[24]而核武器对战争的威慑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其毁灭性力量及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共同构建了稳固的战略稳定性。^[25]

除此之外,弱联盟面对对手呈现出的内嵌型特征使得霸权国和盟友国对竞争对手的威胁认知产生战略分歧。内嵌型特征指对手国与霸权国联盟体系内其他成员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内嵌于霸权国联盟体系内。比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已将中国视为其首要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度持续增强。周方银针对东亚秩序,引入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强调中国的崛起促成了东亚地区经济与安全核心相分离的中美二元态势。^[26]还有部分学者采用了“双重领导”的表述来描述这一现象。^[27]上述论述都证明了中国在地区经济秩序中与美国盟友之间的紧密联系。战略分歧代表重大事项上的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隐含着利益冲突,联盟主导国和联盟成员对于竞争对手的认知分歧导致美国原有联盟体系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降低联盟行动效率和有效性,使得强同盟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弱联盟基于实用主义取向,可以基于不同议题不断重新选择小集团成员,塑造基于规则的秩序更具灵活性。

本文认为是大国无战争时代和竞争对手特征的改变,致使美国开始采取弱联盟的策略,因此需要排除一种竞争性假设:弱联盟策略的选择是基于霸权国实力的衰弱,无法再负担多

个强联盟的成本。安德鲁·本尼特(Andrew Bennett)等学者以海湾战争时期的临时联盟为案例,阐释了威胁平衡、联盟依赖与各国在成本分担中的表现差异。^[28]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指引下,特朗普执政后减少对联盟的投入,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联盟成本,从而维护其在联盟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美国实力衰弱和较少联盟成本输出无法解释弱联盟战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美国与其盟友在联盟成本分担上的分歧由来已久。美国小布什政府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德国和法国都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表示反对,奥巴马等美国领导人则不时流露出对欧洲盟友在安全事务上依赖美国的不满情绪。^[29]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不仅强化了传统联盟关系,还在传统安全领域之外塑造多边合作新形式,推动联盟扩容对美国的霸权进行护持,美国的国家实力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不可能产生断崖式波动,也无法证明拜登执政时期的美国实力强于特朗普执政时期,因此美国减少联盟成本输出构建弱联盟不符合拜登政府联盟战略现实。第二,联盟成本理论多出现在联盟管理范畴,联盟管理和联盟建立理论有所区别。联盟管理指的是联盟成员国根据自身利益考量,通过平衡联盟内部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来维护和促进联盟关系的持续发展,主导国更加关注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联盟建立是联盟成立之前的阶段,且美国意图建立的是针对中国的制衡性联盟,此时联盟的有效性才是主导国优先考虑的因素。面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首先考虑现有联盟成员不被中国拉拢,和美国保持一致队列,并且在已有盟友中不断挑选不同成员组建并维持多个弱联盟的协调成本高于维持原有联盟。第三,美国虽然塑造了诸多弱联盟,但是也在积极推动弱联盟的机制化建设,例如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从非正式对话到首脑会议、联合军演再到准同盟机制建设过程,只是因为对手内嵌型特征导致潜在联盟成员与主导国对竞争对手认知存在战略分歧,美国一时之间无法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多成员强联盟,弱联盟是对强联盟体系的补充和过渡阶段。

(三)弱联盟对塑造基于规则的秩序更具优越性

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美国持续强化“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论述,将此作为向中国施压的关键手段,并视为对华战略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弱联盟对于改变大国权力竞争格局作用有限,但是在改变地区制度和规范方面具有强联盟不具备的优越性。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为扩大全球影响力提出了“基于规则的秩序”。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指出,规则是特定的人为设计,它不仅界定了行为主体的角色与职责,还对其行为进行了规范。^[30]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基于规则的秩序”话语根据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变化不断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并满足霸权国家在特定地域构建稳定秩序的需求。

通过掌控国际规则整合力量和优势,是美国不同于以往霸权国的治理方式。在大国无战争时代,通过传统武力扩张方式直接控制别国和世界资源分配的难度和成本急剧上升,同时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将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到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世界权力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国际规则对体系内国家比以往更具有约束力,主导规则也由此变得更为有利可图。作为这一多边规则体系的主导国家,美国不断加强对各领域的统合,由各种国际组织构成的多边网络、调和与解决冲突的各种渠道、对世界各国动态的协调,都是美国的内部统

合机制。

随着实力的相对衰弱,美国维持其通过传统开放、多边国际规则行使全球影响力的难度显著增加,在国内及国际层面均遭遇了重重挑战。通过传统军事联盟手段巩固“世界领导者”的合法地位给美国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采用弱制度约束联盟来重新制定规则塑造国际秩序,一是可以降低目前庞大且诸多掣肘的多边机制的管控成本,提高控制国际交换渠道的效率,二是减损竞争对手在规则体系中的收益,增加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规则体系中的获益难度,约束其发展势头。

“基于规则的秩序”已经成为美国塑造身份认同的核心抓手,基于规则即基于美国和其盟友制定的秩序规则,涵盖了多种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基于规则的战略表达帮助美国在世界上区分盟友和敌人,不遵守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被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遵守美国秩序的国家被划定为美国的合作伙伴。^[31]美国明确提出未来应对全球秩序变革武力已经不能单独作为塑造全球秩序的手段,利用话语表达和规则秩序塑造才能为美国应对未来制度竞争提供有力保障。美国需要不断增加志趣相同的朋友和伙伴应对各类挑战,伙伴安全合作必须是灵活且富有弹性的。

弱联盟弱化制度约束,减少惩罚性机制,突出非强制性,进而强调一致行动的必要性,在实现手段上强调泛化规则框架下的责任分担。弱联盟将传统军事联盟进行宽松化定义处理,其重要吸引力在于不断地互动和谈判能够加深伙伴国对利益一致的认可度,确保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具备稳定性。弱联盟所塑造的规则秩序,着重于小集团内部成员在特定领域的利益共享,旨在联合那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必要时能携手应对规则破坏者。美国现有弱联盟体系充分强调针对中国的一致性,致力于塑造美国和伙伴之间对敌人认知的一致性,并不断将小多边、弱联盟作为解决地区冲突的对话平台,以凸显其重要性。

四、美国强弱联盟体系和地区秩序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联盟大多是战时联盟,针对实际威胁而不是潜在威胁,战争结束后同盟瓦解,国家在和平时期没必要、没能力去维持联盟,战争爆发后国家仍有时间寻找盟友,当时国家主要精力是建立同盟而非维持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起的联盟架构并未随着对手解体而解体,展现出了稳定性和延续性。选取美国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亚太联盟体系作为案例,地区秩序的施动者美国和影响对象在两个时间段都未发生变化,因此可以控制其他变量影响,重点探究不同联盟体系变化对地区秩序的不同塑造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苏联作为世界上最强的两个权力中心,由于两者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双方迅速走向对立,美国和苏联都想争夺世界的领导权,因此双方不断建立针对对手的制衡性联盟,谋求将更多的成员拉入自身联盟体系,北约和华约的建立形成了两极均势秩序。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为了确保自身联盟体系的有效性,不断增加自身与盟友之间的制度约束,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联盟体系将条约作为核心机制,美国与盟友之间的联系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不断增加与盟友之间的捆绑机制。在亚太地区,美国和日本分别签订了条约,形成了双边联盟——轴辐体系。由于此时日本和韩国同属于资本

主义阵营,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敌视,且日本和韩国与苏联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联系,日本更是二战时期苏联的敌对国,因此日本、韩国对苏联的威胁认知与美国一致,也愿意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同意加入美国成立的强制度约束联盟,且承认美国对联盟体系的主导地位。1951年9月8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3年10月1日,美国与韩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1月,美韩两国签署了《美韩协商备忘录》,1966年7月,美韩签署了《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这些条约文件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制度约束。

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使得两极秩序就此瓦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凭借其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构建单极霸权秩序。美国作为霸权秩序主导国,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巩固政治关系、促进市场开放,不断增加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与其他国家经济联系愈发密切,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崛起为地区性大国,开始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32]

新崛起的中国和美国以前的对手苏联存在两个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方面,中国的进攻性和对抗性弱于苏联,中国并不谋求统治世界,也一直宣称无意与美国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的迅猛增长上,虽然其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但并未与美国陷入军备竞赛,也未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军事同盟来对抗美国的同盟体系。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人类社会与全球为一个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这一理念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关注他国的合理诉求,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各国共同发展。^[33]另一方面,中国已深度融入由美国引领的国际体系,并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维持着紧密的经济交往。冷战时期,美国的盟友与苏联之间界限分明,鲜有贸易、技术交流或安全合作,呈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势。然而,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进入21世纪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美国盟友的主要出口市场,特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中国已成为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亚太盟友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这使得他们与中国的关系难以简单划分为单一的朋友或敌人。

对手特征的变化使得美国很难建立起像北约一样的同盟来管控亚太地区秩序,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弱同盟的优越性。美国采取的是不同领域进行关键制衡,多领域入手塑造问题处理规则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共识,试图以弱同盟形式构建网络化同盟体系,并试图将其常态化和制度化,争夺地区规则主导权。从前的小多边主义侧重于议题合作,旨在吸纳多样化的参与方,当前的小多边主义则转变为霸权国家用来维护小团体利益、阻碍中国发展的策略手段。^[34]美国正大力推行这种小多边及松散同盟的策略,强化“五眼联盟”的合作,组建了美英澳三边合作框架,升级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

2001年7月,美日澳三国提议建立一个聚焦亚洲安全议题的非正式对话平台,这标志着美日澳三边同盟构想的初步成形。2015年7月,日本自卫队首度参与美澳大规模军事演习,预示着三边安全合作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鉴于美国政府将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国家安全挑战,美国提出将美日澳三边合作机制扩大为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美国特别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宣称民主价值观是四国协作的基石。美日印澳四国明确提出四国机制

将不断完善,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威胁。^[35]2023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在日本广岛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议,寻求在亚太地区扩大这一同盟的影响力,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奥库斯”(AUKUS)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简称,其建立目的是升级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除了不断增加三边安全合作,还谋求吸引更多的亚太国家参与其安全合作,尤其是希望日本可以作为首个成员加入其三边合作。^[36]美国不断强化阵营意识,构建足够多的小团体从各个领域对话进行遏制。这些小团体的制度约束远低于军事联盟,因此可以十分灵活地调整团体成员和合作范畴,灵活且针对性处理地区问题。除了新成立诸多团体阵营,美国也通过增加原有团体的合作议题,其中代表性的就是五眼联盟合作议题的拓展。五眼联盟源于二战时期英美的情报协作,成员涵盖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目前五眼联盟的议题远不止于情报合作,更在高新技术领域实行规则竞争。五眼联盟对华为5G的遏制充分体现了现在的五眼联盟对中国的针对性遏制,2018年美国认为华为的技术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在信息领域的控制权,因此号召其盟友对华为进行打压和遏制,澳大利亚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回应,五眼联盟在2019年4月充分讨论了华为5G技术对五眼联盟情报合作的威胁,尤其是网络信息共享过程中中国极有可能借助新技术对五眼联盟国家的共享情报进行拦截。^[37]因此,在美国的主导下五眼联盟不断发布网络安全战略文件,其目的是在网络领域塑造自由主义联盟,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增加西方国家在网络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五、结论

在大国有战争时代,武力和战争是国家间解决利益争端的首选和常用手段,谁能赢得战争,谁就能最终决定利益的归属,因此,与其他国家结成稳固的强联盟,增加自身国家实力,以联盟内霸权国家本身的偏好塑造国际秩序,是霸权国塑造地区权力格局的有效途径。

大国无战争时代和内嵌型的对手特征增加了霸权国对弱联盟的使用偏好。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进步,核武器的出现、主权原则的深入人心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改变了国家博弈方式,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异常困难。除此之外,此时霸权国面对的对手内嵌于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且与其盟友们有着紧密联系,因此霸权国和盟友对竞争对手的威胁认知存在战略分歧,霸权国很难重新组织一个强制度约束的多边联盟。在二战结束至今的大部分时期里,美国在亚太区域构建的联盟体系主要呈现为双边形式,而非多边架构。美国实施的双边联盟及小多边策略,实际上是在多边联盟构想难以实现的背景下,做出的一种次优选择。美国采取弱联盟策略是对强联盟的有效补充,重新组织成员,在不同议题领域采取小多边主义,组建不同的弱联盟,可以弥补传统强联盟效率低下、难以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困境,推动联盟扩容以助力霸权护持。弱联盟基于实用主义取向,可以基于不同议题不断重新选择小集团成员,塑造“基于规则的秩序”更具灵活性。

美国频繁构建针对中国的小多边弱联盟,并不代表美国放弃传统强联盟,弱联盟只是美国追求霸权战略目标、遏制中国崛起时采取联盟战略的一种补充手段,具备明显的大国竞争

倾向,核心目标仍旧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面对美国不断打造“弱华制华”的弱联盟,中国需细致剖析美国在不同领域领导的小圈子发展路径及其对华的具体影响,从而加强精准施策。弱联盟与传统强联盟存在最大的区别是制度约束较弱,没有明确的惩罚机制和条约限制,因此给中国实行“楔子战略”提供了机会。中国应采取多元化的策略,积极谋划、审慎应对,拉打结合,分化弱化美国反华联盟,为自身发展营造持久有利的周边环境。

参考文献

- [1] 杨原. 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和互动机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07.
- [2] 王鸿刚. 如何看美国搞的“集团政治”?[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12-04.
- [3]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
- [4] 斯蒂芬·沃尔特. 联盟的起源[M]. 周丕启,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2.
- [5]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4, 2019, p.33.
- [6]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利与相互依赖[M]. 门洪华,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9-21.
- [7] 约瑟夫·奈, 戴维·韦尔奇. 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M]. 张小明,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419-420.
- [8] Hedley Bull. The Anarch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M]. Palgrave, 2002, pp.4-18.
- [9] 唐世平. 国际秩序的未来[J]. 国际观察, 2019(2): 6.
- [10] 亨利·基辛格. 世界秩序[M]. 胡利平, 林华, 曹爱菊, 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479-481.
- [11] Charles Poor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12]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8, No.3, 2004, p.354.
- [13] 祁怀高. 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并存[J]. 当代亚太, 2011(6): 56-74.
- [14] 孙学峰, 黄宇兴.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J]. 当代亚太, 2011(1): 6-34.
- [15] 凌胜利. 霸权护持与拜登政府的议题联盟[J]. 和平与发展, 2024(2): 24.
- [16] Paul Dibb.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oalitions: How Useful? How Manageable?[J].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5, No.2, 2002, p.132.
- [17] 孙德刚. 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3): 61.
- [18] 刘丰. 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J]. 外交评论, 2012(5): 59-60.
- [19] 夏立平. 特朗普政府建立南海“议题联盟”初论[J]. 东南亚研究, 2018(6): 66-84.
- [20] 孙振民, 任琳.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权威与议题联盟选择[J]. 东北亚论坛, 2022(6): 87-104.
- [21]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 2011, pp.165-166.
- [22] 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Formal Alliances, 1815-1939: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 No.1, 1966, p.5.
- [23] 刘丰. 类型化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设计[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8): 44.
- [24]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p.24-25.

- [25] Kenneth N.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4, No.3, 1990, p.740.
- [26] 周方银.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J]. *当代亚太*, 2012(5): 4-32.
- [27] 王俊生. 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J]. *当代亚太*, 2019(2): 126-154.
- [28] Andrew Bennett, Joseph Leggold and Danny Unger. Burden-Sharing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1994, pp.39-75.
- [29] 田旭.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联盟政策的调整[J]. *国际经济评论*, 2019(6): 107.
- [30] 罗伯特·基欧汉. 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M]. 门洪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73.
- [31] 刘雪莲, 朱瑞. 美国“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本质内涵及现实分析——东亚海洋秩序视域[J]. *国际展望*, 2023(4): 84.
- [32] Rebecca International. Defending the Maritime Rules-Based Order: Regional Respons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EB/OL].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system/tdf/private/ewc_policy_studies_80_-_defending_the_maritime_rules-based_order_-_regional_responses_to_the_south_chinese_disputes.pdf?file=1&type=node&id=37485, 2021-12-10.
- [3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59.
- [34] 赵祺, 罗圣荣.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 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的视角[J]. *东北亚论坛*, 2023(2): 73.
- [35] 韦宗友. 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新动向及其影响[J]. *当代世界*, 2020(12): 44.
- [36] 李途.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 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J]. *东北亚论坛*, 2023(6): 96.
- [37] 王怡仙.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五眼联盟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22: 65.

[责任编辑 许佳]

ABSTRACTS

The Weak Alliance System of the U.S. and the New Type of Regional Order Competition in the Era of No-War-Among-Great Powers

XU Jin BO Rong-kang · 3 ·

Abstract: In the era of war-among-great powers, a stable strong alliance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hegemonic powers to increase their strength, secure victory in wars, and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references. In an era of no-war-among-great powers, coupled with embedded characteristics of opponents, hegemonic powers prefer using weak alliances. The emergence of nuclear weapons, the deep-rooted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have made war among great powers extremely difficult. At the same time, as a hegemonic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competitors who are embed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t leads. China has close ti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ia-Pacific allies. Therefore, weak alliances have become an effective supplementary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pete for a rules-based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eak alliances, based on pragmatism, allow for the continuous reshuffling of small group members based on different issues, offering more flexibility in shaping a rule-based order. The weak alliances constru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ffectively complement strong alliances and exhibit a clear tendency toward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with a core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containing China's development. China needs to carefu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U.S.-led small groups in different fields to strengthen preci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 the "wedge strategy," combine engagement and containment, divide and weaken the U.S.-led anti-China alliance and create a lasting and favorab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Key Words: Weak Alliance; Strong Alliance; Era of No-War-Among-Great Powers; Regional Order Competition; Hegemonic Power

The U.S. "Chip Choke" Strategic Narrative Toward China: Spread of the "Enemy Image" and Its Dilemmas

GAO Wang-lai · 14 ·

Abstract: The "chip choke" is a key U.S. strategy in high-tech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is strategy leverages chips as a primary tool and utilizes the U.S.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o suppress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through export controls, long-arm jurisdi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echnology alliances, aiming to strategically outcompete China. This article uses strategic narrative theory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goes from narrative subjects, and narrative competition to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It examines how the U.S. has engaged in narrativ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high-tech field since the passage of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in 2022 through stigmatizing tactics, reinforcing China's "enemy image," suppressing China's discourse, and seeking discourse hegemony. This strategy faces multiple dilemmas in practice. The logic of the strategic narrative has stifled rational voices that objected to the treatment of China as an enemy, reinforced the stereotypical image of China within the U.S. strategic community and supported the policy of suppressing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through a strong containment policy. As a result, it foreclosed the options for the U.S. to change its high-tech policy towards China. With the obvious negative impact of the "chip choke" strategy o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the U.S. strategic narrative towards its allies faces opposition from multiple countries, further exacerbating the inherent risk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long run, this strategy will ultimately be unsustainable.

Key Words: Sino-American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p Choke" Strategy; Strategic Narrative; Enemy Im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New Changes in Geopolitics in Northeast Asia in an Era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BA Dian-jun WANG Zhen-bin · 29 ·

Abstract: In an era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faces significant external challenges. As a strategic convergence point for major powers, Northeast Asia remains a crucial strategic pivot for China and is essential in fostering a stable region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U.S. external interventions have increasingly undermined regional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whil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region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have become more pronounced. Currently, Northeast Asia's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s undergoing new transformations. The region's complex and volatile security environment has been further intensified by the "binary paradigm" constructed by the U.S., Japan, and South Korea, which accentuates competitive state relations within the region. Interactions among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economically driven to being politically driven. The trend of regional cold war has intensified under a "self-help + mutual assistance" model. Overall,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Northeast Asia's geopolitical landscape reveals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inued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the "post-unipolarity" era,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regional power balance in the era of "slowbalization," and the coexistence of rigid international system constraints wit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se dynamics pose new challenges for China's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structing a new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for Northeast Asia, through the lens of China's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emerges as a crucial task for advancing positive regional order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Northeast Asia; Geopolitics; Post-Unipolarity; Slowbalization;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 "Weaponization" of Algorithms: Embedded Security Risks in the Era of Computational Politics

DONG Qing-ling GUAN Yi-wei · 44 ·

Abstract: Currently, advancements in algorithmic technology are driving a comprehensiv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y. As the foundational logic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ocietal operations, algorithms have restructured the material basis of power, formed the power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other powers, generated new power entities, and triggered the dynamic adjustment in power structures, thereby becoming a form of "meta-power." In this context, as a higher form of power, algorithms are increasingly used by major powers as weapons in power competition. In essence, the "weaponization" of algorithms refers to actors purposefully, systematically, and consciously using algorithms to gain power, influence others' behaviors, counter competitors, secure benefits, or ensure security, ultimately achieving political goals. In cases like Iran's "Twitter Revolution" and the U.S. TikTok ban, the U.S. government has demonstrated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weaponize" algorithms, aiming to leverage algorithmic tools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o contain rivals and shape new hegemonic advantages. The U.S. policymakers view algorithms not only as possessing powerful capabilities to manipulate public perception, intervene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incit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ut also as having immense potential to alter economic patterns and shape social development forms. Against this backdrop, algorithms are increasingly employed as weapons in the competition fo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social rule-making, strategic dominance, and power games, giving rise to complex security risks characterized by the